

明代云南土司境内犯罪处罚规定与司法实践

程彩萍

(廊坊师范学院 历史系,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明代中央对云南土司的管辖整体上是逐渐加强的,汉法在云南地区的实施亦较之前更为广泛。由于云南土司云集,明律在推行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适应当地司法环境的特殊规定。一方面对云南土官、土民等审判程序进行调整,提高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明代云南地区的司法控制遵循了政治上“以夷制夷”的思想,不论刑罚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方面,多对世袭土官有所宽容,以示朝廷的“抚夷”之道。

关键词:明代;云南;土司制度;境内犯罪;审判程序;司法控制;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111-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19

The Punishment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In-country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Chieftains of Yunnan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CHENG Cai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China 065000)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ing to the Chieftains in Yunnan province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the implement of laws to this area was also more extensive in the Ming Dynasty. A lot of special regulations were formed to adapt the local judici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 of the laws from the contemporary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Yunnan province was the gathering place for the Chieftains. On one hand, the efficiency of judicial trial was raised because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judicial procedure to the Chieftains and the local offici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emporary judicial control followed the rule of autonomy and showed more tolerance to the hereditary officials for both the criminal laws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show concilia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Yunnan province; the Chieftain system; in-country crimes; the trial procedure; judicial control; judicial practice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虽自汉唐以来为中央朝廷所统,却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治性质,中央对该地的管辖以羁縻之策为主。元朝始开省设官,然“教化”阻滞,仍以“夷俗”为重。至明初朱元璋统一云南地区,一方面亦认识到该地诸“夷”杂处,难以治理,故沿用“以夷制夷”之术,设立土官,子孙世袭;另一方面通过土官朝贡、承袭等制度,以及派设总兵等官常镇其

地,加强了中央对土司体系的控制。其中明代对云南土司的司法控制是治理该地区的重要一环,在输入汉法,施以教化的同时,又不断做出了适应该地的制度调整,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

一、明代云南土官、土民犯罪之审判程序

明初朱元璋在以武立国的同时还发扬了“重典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13&ZD090);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钦差内官与明代北直隶地方治理研究”(BJ2017077)。

作者简介:程彩萍(1986—),女,山东诸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代军事史及明代制度史。

①相关研究有方慧《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文中指出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在云南的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明代与元朝的区别。

治国”的理念。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大明律》很快在整个明朝统治范围内推行,云南地区亦不例外,并且汉法在该地实施的彻底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然而,由于云南离京万里,又多土官衙门,社会状况相较内地有很大不同,因此在推行汉法的过程中,当地的司法官员不断提出新的调整措施,包括司法审判程序等,以逐渐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

(一)云南土官犯罪审问程序的演变

云南是明代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地区,明初统一云南以及后来平定“叛乱”之时,有土人头目投降归附者,或随军征进建立军功者,总兵等官为其奏请除授文武职官,传之子孙袭荫,令其管辖土人,并负责守御边境。据《南中杂说》记载:“明朝旧制,两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过云南、大理、曲靖、临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归命。”^[1]可见云南土官分布很广,且多彪悍,难以约束。其中“元江、永宁、镇沅、孟良、景东最强犷,镇南、蒙化、顺宁、沾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调济为难”^[2]2280。明初云南布政使司因土官犯罪律条无所依据,乞加定义。朱元璋命六部官会议:“凡土官选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世袭者,所司不许擅问,先以干证之人推得其实,定义奏闻。杖以下则纪录在职,徒流则徙之北平着为令。”^[3]由此可知,明初为了安抚有功或归附的世袭土官,规定他们若有犯法,必须具奏,方许拿问。

这一规定成为明代云南地区提审犯罪土官需遵守的定例,至宣德年间仍然未有改动。当时,云南监察御史杜琮已经认识到土官有犯应奏请提问,本是以宽待之,但是他们却恃恩愈益纵肆,每每犯罪即以进贡为名迁延避匿,或巡历乡村横敛无厌,导致人多受害。因此,杜琮奏请:“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请,六品以下听巡按御史、按察司提问,庶革奸欺。”然而,宣宗皇帝却固守祖宗成法,认为土官不可尽用汉法,谕之曰:“蛮夷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琮所言过矣,其循祖宗成宪毋改。”^[4]

土官有犯应奏请提问的规定,到成化年间出现略微变通。除了归顺或有功的世袭土官外,明代还

有大量纳粟授职的土官,他们大多是殷实的旗军、土人。明朝根据上纳谷物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令其在当地管事。这些土官之中有恃其富豪,恣意妄为、横行乡里者,若被人告发到官,遵照旧例,不分官品高低,具本参奏。但是,往往因为参奏时间太久,多被幸免,以致土官愈加凶暴。很多云南司法官员意识到其弊端,于是成化二年(1466年)闰三月,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王祥奏准将以上“不拘职分大小,具参奏提问”的旧例予以调整。他认为投降归附并随军征进得授土官者,固当念其勋劳,亦如有功军职,不许擅便勾问。其纳粟等项得授官职,已受朝廷大恩,若不严加禁治,恐暴横日甚。因此在他的提议下,拟定新的提审条例,并通行所有设土官之地:“合行云南、贵州、湖广、四川、两广有土官去处,巡抚都御史、巡按都御史、按察司官。今后有犯,除投降归附、随军征进得授土官及纳米等项武职并文职五品以上者,仍照旧例奏请提问。其纳米等项除授文职六品以下官员有犯,照依提问六品以下文职律例,即便提问发落。”^[5]417成化八年(1472年)四月,该条例又得到重申,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①

另外,根据云南等地土官所犯罪情的轻重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其中与以往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笞杖轻罪与真犯死罪上。弘治《问刑条例》规定:“云贵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官,并各处大小土官,犯该笞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罚俸,无俸者罚米。其徒流以上情重者,仍旧奏提。”^[6]286《问刑条例》中还规定:“凡军职并土官,有犯强盗人命等项真犯死罪者,先行该管衙门拘系,备由奏提。”^[6]276可见,不同的审判程序适应了不同程度的罪行,轻者删繁就简随即发落,极重者防止罪犯逃匿先行拘留,由此提高了对云南土官犯罪的审判效率。

(二)云南通事犯罪的拘审

云南地区除了土官身份特殊外,还有一类人也较为特殊,他们就是负责翻译的把事、通事。他们谙晓夷语,以通传言语,管办粮差。其中有吏典保充者,有由农民保充者,后或纳马纳粟冠带荣身,皆可

^①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六《土官六品以下径自提问例》,杨一凡等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四册,第255页。具体为:“今后土官有犯,系归附从军,径进得授土官,及纳米等项文职并武职五品以上,仍奏请提问。其纳米等项除授文职六品以下官员有犯,照例提问发落。”

在衙门办事。他们既不属于土官,又与一般平民不同,《大明律》中并无关于通事的规定,若遇到犯罪者,曾一度使当地法司无措。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据云南临安府知府周瑛等奏,他们往往倚称冠带,靡所不为:“有将长官司钱粮,侵欺入己而不纳者;有拨置土官互相仇杀,搅扰地方者;有起灭词讼,挟制有司,把持官府者;甚有管哨妄拿平人为盗,擅杀死者。”^{[5]253}这些违法通事被传唤至官府后,即以冠带身份为名,令法司难以提问。因此经周瑛奏准,“今后各处长官司等衙门,但系由吏典、农民选充把通事,后虽纳米等项冠带,犯罪宜徒,该管司、府、州、县提问明白,依律照例发落。如犯贪淫等项,例该革役者,革去为民,另选良民补充。”^{[5]254}由此,若通事有犯,有司正官可径自提问,以此加强对该群体的司法控制。

(三)土官衙门“夷”民诉讼程序

明代对军民词讼逐级审理,禁止越级诉讼。《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由于该条律令对土官衙门的诉讼没有明确规定,随着土官争袭以及土人之间兴讼现象的加剧,土官及土人赴京越诉者愈加频繁。

弘治元年(1487年)五月内,云南楚雄府知府邵民针对土官衙门诉讼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5]625},经刑部尚书题准,该条例修订后被纳入弘治《问刑条例》中。在该条例中,允许土民词讼在上司不与受理的情况下,申请巡抚、巡按查究。另外,还特别指出了土官所辖夷民与军卫有司所辖者的区别:“若土官及土人夷人蓦越赴京奏诉,系土官所辖者,免问。系军卫有司所辖者,问罪,俱给引照回听理。所奏事情除叛逆机密并地方重事外,其余户婚田土等项,俱行巡抚巡按等官,或都布按三司,审系干已事情,查提问断,仍将越诉罪名并问。”可见,该规定对土官所辖夷民更加包容。如再次赴京奏告,则不分军民夷人,皆回原籍官司问断。奏词除有关重事外,其余不分虚实,俱不予立案。由于“夷人”与汉人处治有所不同,为了防止汉人假冒“夷人”越诉,《问刑条例》规定:“其汉人投入土夷地方,冒顶夷人亲属头目名色,妄奏代人报仇,占骗财产者,问发边

卫充军。”^{[5]370}

由上可知,明代法律在保证正常诉讼程序的前提下,尽量保护土民的诉讼权,这与他们所处的法律环境亦相适应。所谓的“真夷”土官土人,他们因常年僻居山野,语言不通,不识文字。由于户婚、田土、斗殴等事,不可避免产生词讼,有向本管司衙告理,却不与受理,或不能公断者,以致发生仇杀。有不得已越诉上司,或赴京奏告,若一概不予立案,将其问发边卫充军,致使情不上通,有失抚夷之道。因此,土民与一般平民尤其有意冒充土人的奸诈之徒,法律待遇不同。明代律例规定:“若系临近府县居民及腹里逃军囚匠人等投入村岗,诈冒通把头目,并土官土舍人属族,代人报仇,占人田产,骗人财物,空纸用印及捏写本状,或教唆主使真夷土人赴京奏告,搅扰官府者,审勘得出,照令拟奏,问发边卫充军,原词立案不行。”^[7]明代云南地区的司法人员不断根据实际问题提出新的审判方式,且有很多适应于整个西南土司体系,这有利于促进该地区司法活动的有效进行。

二、明代云南土司求治防乱的法律规定

明代危害云南地方社会治安的因素多与土官、土民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诸如土官争袭引起的词讼甚至仇杀,土民聚众为盗,边境通“夷”,外地人潜匿云南为非生事等。针对扰乱云南土司社会安定的诸多不法行为,明代法律及时做出了相应的惩罚规定,有些还推行到整个西南边疆,这标志着国家对云南等地的治理更加深入。

(一)土官犯罪处罚规定

明代律例中针对土官事宜记载最多的是对土官承袭的规定,这与土官之间不断发生争袭事件有关。如总兵官黔国公沐琮所奏:“(土官)被无籍通事人等家奴专一取材害民,百计拨置,将大作小,以庶为嫡。及至土官亡故,下人得遂奸计,任其勾引刁顽之徒,巧捏虚词,妄行告保外族别枝。上司因无的确宗图查考,所以夷民不服,连年仇杀,地方不宁。”^{[5]299}有明一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中,其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若违律袭替则予以处罚,如:“应袭舍人,若父见在,诈称死亡,冒袭官职者,事发问罪,调边卫

充军。候父故之日,令以次儿男承袭。”^{[8]833}

针对土官有犯的专门惩罚条例还有“纵军虏掠”一条,嘉靖《问刑条例》记载:“土官土舍纵容本管夷民头目为盗,聚至百人,杀虏男妇二十名口以上者,问罪降一级。加前数一倍者,奏请革职。另推土夷信服亲枝土舍袭替。若未动官军,随即擒获解官者,准免本罪。”^{[5]649}该条例适应了云南所属土司地区多盗的社会状况,督促土官约束土民,防止作乱现象。另外,土官之间互相仇杀亦是法律所严厉禁止的,如有违反,重者则取消世袭资格,改土归流。如嘉靖十四年(1535年)议准一条:“云南、四川两省土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遵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助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久,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所争村寨,平毁入官。”^{[8]626}

土官违法行为不止一端,然而除了叛逆谋反等罪不可赦外,明代律例对待世袭土官较之其他职官有所宽容。如《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至八十贯绞。^[9]《问刑条例》规定:“凡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受财枉法至满贯绞罪者,发附近卫所充军。”^{[6]893}然而土官初犯,则可纳米还职。据都察院黔字四百五十二号勘合,札付内一件:“科官事,今后有职土官犯该绞、斩、徒、流、杖罪、初犯者照例纳米等项,完日还职。再犯监候,奏请发落。”^{[5]256}具体案例如下:

犯人李暹招系云南府安宁州罗次县巡检司土官巡检。成化八年(1472年),暹自盖楼房,不合科要弓兵罗必白等木头四百五十根,逼要弓兵普信银六两,又因巡捕,将民人赵能并妻捉打,吓要银二两各入己。事发到司,参提问拟暹恐吓取财,减等徒罪。系土官初犯,照例纳米还职。^{[5]255}

该犯人李暹初次犯赃照例惩处,不久又接连索取他人财物,被告发:

成化九年(1473年),有军人夏谨将骡马驮货过关,暹不合索要斫骨刀三把,成化十年(1474年)月日不等,三次夏谨有驮带鱼、布等货过关,暹又索要盐鱼一十五斤,毡帽一顶,红毡条二床。成化十一年(1475年)六月内,夏谨卖货过关,索要棕索十副,红帽两笼十个,槟榔

五吊各入己。遇蒙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初八日赦宥,不合不行改正,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八日,二次夏谨又驮铁锅等货过关,暹又不合索要铁锅二口、槟榔四吊、红布二丈,象牙、胭脂盒四副。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内,夏谨挑货过关,不合索取木梳三把,俱入己。夏谨不甘,将情赴都察院处告。^{[5]255}

云南按察司议得李暹所犯,“合依监临官挟势求索部内财物者计赃,准不枉法论,无禄人一百二十贯之上罪止律减等杖一百,徒三年,纳米赎罪。缘文武职官犯赃罪,例该为民”。然依照土官处治条例,李暹犯赃二次,故奏请发落。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覆议,他查到天顺四年,户部等衙门尚书年富等奏准,“系蛮夷种类世袭之人,初犯纳米还职,再犯奏请发落。若系有司军民等籍保除,叫名土官,不系蛮夷世袭之数,照文武官犯赃罪例发落。”最后此案奉明宪宗圣旨:“李暹系世袭土官,纳米,完日还职。”^{[5]256-257}可见,世袭土官较之一般文职官及叫名土官^①享有更高的法律特权,体现了明朝对待土官的怀柔之道。

(二)云南土司境内其他官员犯罪处罚规定

明代云南地区除了设置土司以外,还设有抚按官与都、布、按三司,并派遣沐氏子孙担任总兵官世镇其地。上述文武官在安抚土官、平息盗贼等方面的职责关系到土司境内的安危。

云南土官争袭除了土官本身的原因外,当地官员勘合不力亦是重要因素。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云南、两广、四川等处土官有十余年不得袭者皆相率北京奏乞,并声言这是因为抚按官避嫌远怨,不与给勘所致。^{[10]5899}针对此种弊端,法律上需要加强勘合力度,因此规定云南镇守、巡抚、巡按、三司等官查勘,但有争袭土官,仍令各该堂上官及时从公保勘,拟定荫袭人之姓名,具奏定夺,不许有所推避。所勘内容包括“见任土官历任根由,及流派到于某枝某人承袭。所娶妾某人有无嫡庶男女,某人本宗,不该承袭亲族某人”^{[5]300}。勘合后的宗枝图本造册缴报。嘉靖时期有令:“若应袭土舍有罪未结或争袭未明者,各官速为勘处,若延至一年之上不为勘

①按,“叫名土官”指西南地区通过保举担任州县或巡检司等官员,他们属军、民籍,非世袭土官。

结,或本部转行覆勘一年之上不行回报者,听抚按及本部查参治罪。”^{[10]821}

另外,遇到土官告袭,法律还禁止有司索取或接受土官贿赂,令府县立即勘报。嘉靖十年(1516年)议准:“各边军职及勘事人员,索取土夷财物,致生他变者,依激变良民律例。”^{[8]626}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土官争袭导致的社会动乱。嘉靖《问刑条例》也明确规定:“云南、两广、四川、湖广等处流官,擅自科敛土官财物,金取兵夫,征价入己,强将货物发卖,多取价利,各赃至满贯,犯该徒三年以上者,问发附近卫所充军。”^{[6]902}事实上,该则条例更有利于约束云南流官利用土官袭职进行勒索,对于保障地方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云南土官之间相互仇杀以及强盗劫掠是当地治安最大的隐患,明代法律不断强调文武职官在预防、应对上述问题的职责,规定若有违犯则受到惩罚。弘治三年(1490年)九月内该兵部尚书马文升等题准:“通行各处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今后遇有劫库、劫狱、杀人并伤至百人以上等项重情,及土官互相仇杀,务要星驰奏请,及早扑灭。如或延缓隐匿,酿成大患,致坏地方,听本部并科道官访实参奏,治以重罪。”^{[5]1049}

(三)外地人在云南土司境内犯罪处罚条例

云南地处边疆,山多田少,吸引了浙江、江西等地的大批商人前来赢利,他们遍处城市、乡村、屯堡,收购米谷,贱买贵卖,甚至娶妻生子,置买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明代中期以来,商业逐渐发展,行商远赴他乡愈加普遍,对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其中亦有“诡诈之徒”。据云南姚安军民府阴阳学正卫甘理所言:“或逐托公事,或造追钱债,搅扰衙门,军民受害……或起挑词讼,诈骗财物,无所不为。”^{[5]493}例如有商人居于瘴疠地方,不服水土病死,辄便奏告土官人等,谋毒人命,以此诈欺钱财。故此,卫甘理奏请:“行云南按察司,着落各卫府查勘所属乡村、屯堡、城郭去处,但有江西等处客商,不问人引新旧,尽数拿解原籍当差,不许托故稽迟。及窝藏隐蔽,连歇家人等一体治罪。”^{[5]493}最后得到批准,令云南按察司查究。

除了江西客人聚集云南谋求生理外,这里还是逃军、逃囚等潜匿之所。他们之中有的潜投土官远

方亲族,代之捏写词状,争夺官职。稍不遂其意,便唆令土官劫夺村寨,举兵仇杀,令“夷人”受害,不可胜言。如:“武定府土官金甸病故,伊妻商叶要袭土官,被云南在城歇家金辉骗伊金银不计其数。商叶病故,又保伊女安德袭职,仍前骗银。及至安德事发,即将赃物诬指他人承认,人所共知。”^{[5]302}这与云南土官争袭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遇到袭职时,往往差心腹通事、把事赴城投托城中市井,代其整点文书,却多被诓骗财物。甚而导致地方官保勘土官时互相推延,致有五、七年之上不得袭者。为了解决此社会弊病,成化十七年(1481年)二月题准:“今后但有似前代替土官打点文书,指引营求势要,诓骗财物,及拨置不该承袭之人争袭,致令仇杀,扰害地方者,不分官舍、军民,问罪追赃,完日俱发广西烟瘴地方充军。”^{[5]303}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奏准:“土官袭替,其通事把事人等,及各处逃流军囚容人,拨置不该承袭之人争夺仇杀者,俱问发极边烟瘴地面充军。”^{[8]626}

另外,法司还注意到术士等潜入土民聚居地为非者,故弘治三年(1490年)出台了一则条例对此种行为进行惩处:“各处有无职役、无文引、假充算命相面、形迹诡譎、语言狂妄、出入蛮夷土官衙门者,听巡抚等处官拿问。系军者递回原卫,系民者递回原籍,系官吏解至吏部收查发落。若是恣逞邪术妄言祸福,教唆夷人,致惹边衅者,问罪毕日俱发边卫充军。”^{[5]1049}

明代云南土人因交通不便,少与外界来往,性较质朴,而前去经商的江西客人、江湖术士等的活跃的甚至“投机”的谋生手段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在当地法司看来,他们都不安分的流民,因此专门制定律条加以约束,甚至提议,将其全部驱除出境。这反映了外来流寓人正冲击着云南旧有的社会结构。除去上述诸多不法行为外,这些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社会的进步。

三、明代云南地区因“夷”而异的司法实践

云南地区司法控制的力度在明代有了很大提高,国家法律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另外,明代中央亦注意到了云南土司的特殊性,如上述很多法律规定是专门针对云南土司有关事宜而制定的。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特殊之处,因出于政治、军事因素的

考量,贯彻了国家“以夷治夷”“治以不治”的怀柔之道,在对待土官、土人方面与流官有所差别。

云南土司聚众为盗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是治理云南需重点关注和预防的问题。面对土司作乱,明朝廷向来先施以恩德,试图劝止,军事上秉承外示优恤、内实严备的防御之法。故而,明代云南司法审判对作乱土人也以“恩威并重”为原则,往往严惩首犯,其余胁从则从宽处治。正统三年(1438年),云南马者珑乡等寨“反贼”火头纠同阿苏阿赤等聚众劫掠,英宗敕谕总兵官沐晟等:“令宣布朝廷恩威,谕使悔过,如复负,固量调官军、土兵擒获首恶诛之,其余胁从悉原贷。”^{[11]752} 正统五年(1440年),鹤庆军民府为事土官知府高伦妻刘氏同伦弟高昌豪民洪春等纠集罗罗摩些人为乱,英宗仍作如上处治:“量调操备官军擒获首恶解京,诸所胁从悉加宽贷。”^{[11]1219}

明朝廷对云南聚众为盗的土人虽以招抚为先,然而若强盗团伙一再危害当地百姓,屡次招抚不成,亦会采取强硬措施,施以严惩。正德年间,云南弥勒州十八寨盗阿勿、阿革等纠众数千焚掠数地村寨,当地官员集兵胁抚,阿勿等拒之,最终巡抚何孟春出兵讨之。事后,诛十八寨“夷贼”阿寺等八十三名,并于当地梟示。^{[10]326}

当时云南除了盗贼比较猖獗外,土官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断发生,且有持续十几年者。然而明朝廷对待此类问题采取消极干预的方式,即“以夷治夷”的思想。解决土官之间的这种政治、军事矛盾往往不以汉法为准。嘉靖初,云南缅甸、木邦、陇川、孟密、孟养等处土官忿争仇杀,后经巡抚、巡按等遣官劝谕,诸“夷”皆伏罪退还侵地,并欲进贡求赎,总兵沐绍勋认为:“木邦、孟养戕杀无辜,多鲸手刃兄弟,律以王法,罪不容诛,但边徼诸夷忿争仇杀,乃其常态。今既输服,请姑贯其罪,许令进贡自赎。”明世宗准其所奏:“思伦、罕烈能畏威效顺,俱准赎罪。多鲸罪逆尤重,但远夷不足深较,姑令悔悟自新。”^{[10]2157} 这便体现了明代君臣对待土司坚持“治以不治”的思想,即使犯有“罪不容诛”的死罪,若能悔改,停止干戈,亦有赦免的可能。可见,汉法在云南的推行有其不彻底性。

然而,为了加强中央对云南的控制,需要树立国家律令的威严。即使有诸如上述案例中体现的“怀

柔”思想,对外仍要做出声明。如云南土舍安铨与武定军民府土舍凤朝文先后作乱,只将谋逆者问罪,其余皆宥免。事后,刑部奏准令云南法司向土官宣谕此次宽宥只是一时权宜,并非以后为盗杀人皆可逃避法律,以此强调律令的权威。《明世宗实录》记载:

云南番夷杂处,故设土官,使以夷治夷。其千纪者,必绳之以法。顷缘安凤二贼扇乱,诏惟罪其谋逆,余悉宥原,盖一时之权宜也。非谓自是以以后,杀人及盗皆不抵罪。乞敕所司宣谕之。上曰:“然,肆赦恩命皆谓颁诏之前,非着令也。今后土官有犯,仍照律例科断,但宜亟为谏决,毋得留狱以失夷情。”^{[10]2355}

云南法司极为注重利用国家法律维护当地社会的安定,一方面通过宣扬国家执法之严,警告、约束土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于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政治理念,因此出现了宽宥犯罪土官之后的声明,以免失去法律的威慑作用。

云南流官在处理土官问题上违反律令者,往往被严惩。嘉靖时期,云南巡抚游居敬未奉旨听候会勘,即调土汉兵五万余,费以数万计,进兵围剿阿川东堂,被问罪。^{[10]8133} 最终游居敬以擅调军马者律谪戍边远充军。万历初,云南临安地方“依寇”猖獗,巡抚邹应龙两次用兵失败后致仕离开云南,结果“依寇”更加肆虐。云南法司回奏其罪,拟从未减,遭到神宗驳斥:“前后所奏应龙情罪已明,如何曲为回护?再行查勘,着革去原任为民。”同时,敕谕兵部等官:“近来云贵各土夷地方,屡因小衅辄起兵端,皆由各土官贪污腹索,骚动夷情,抚镇官抚驭失宜,要功生事,以致祸结兵连,反费朝廷处置。今后再有这等的你部里并该科参来处治。”^{[12]964}

云南土司地区如出现社会动乱,从抚镇官到卫府州县各衙门官员皆要受到斥责,若再处置不当,酿成大乱者则需受到法律惩处。在处理“土夷”问题上,这种宽与严不同的倾向性,体现了云南地区司法实践中因“夷”而异的处罚原则。

四、结语

明代对云南土司的治理不断加强,其中司法系统的建设与律法的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云南地方官的法律意识在此过程亦有所增强,如云南

巡按邓溪等声称讨伐作乱土官,当先明正其罪,不可任意出兵:“即当明正其罪,请行天诛,若何以征讨大柄付之细人,署将之手以军事为儿戏……”^{[12]8946}此即所谓出师有名,以令其他土官信服。

然而,由于云南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土司制度的执行,很难完全或彻底贯彻汉法,并且明代君臣亦认为此地不能尽用汉法来约束。张居正曾就如何有效治理云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其种类忿争相杀,固其性然。又非可尽以汉法绳也……故仆以为制御土夷之道,惟在谨修内治。数语尽之矣,廉察边吏,毋令贪吏需索结怨,起衅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镇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术欺诱之。但令遵奉约束,不废贡职而已,此外不必过求。”^{[2]3506}可见,他强调制御“土夷”之道,惟在谨修内治,不可过度用法,因此当遇到土官之间争讼时,他主张“其中或有争忿相讼者,两是而俱存之,概行会勘,亦毋轻为奏请。待其彼此相戕,胜负已决,吾视其理直而为众所服者,因而抚之。理曲而为众所不悦者,因而除之……南北夷虏之势不同,其处之之道亦异”^{[2]3506}。显然,他的这种主张仍遵循了“以夷治夷”的思想,两者相讼不相干预,最后以胜负论之。从司法控制角度看,这种做法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

明代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张居正一人,在他之前的杨一清亦认为:“盗贼生发责在土官,遣一介之使临之,实时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术。汉兵不过壮声势以固根本焉耳。”^{[2]1140}又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云南按臣会议事情,其中被批准的一条建议称:“夷俗难绳汉法……惟徐图抚谕,大都欲详内略外,治以不治,其于殊俗夷情为稳妥简便。”^{[12]1754}以上观点从某方面反映

了明廷对待云南土司的态度。虽然明朝统一云南以来,通过建儒学、行教化、派流官、遣军队、置商屯等各项措施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并开始了改土归流的举动,但以此改变当地社会风貌的过程是极为缓慢的。明代君臣仍然采取较为缓和与保守的方式,在推进汉法的同时尊重“夷俗”。这种求稳求简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法的有力推行,尤其导致对边区土司的约束力日益减小。

[参考文献]

- [1]刘崑.南中杂说[M]//丛书集成新编:第9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567.
- [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姚广孝.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560.
- [4]杨士奇.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657.
- [5]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M]//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 [6]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G].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
- [7]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M]//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511.
- [8]申时行.(万历)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大明律[M].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81.
- [10]张居正.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1]李贤.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2]叶向高.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